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共产党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拉貢的小說“共产党人”

1

資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近十年来受到我国讀者越来越显著的重视。这首先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爭取人民民主和保卫持久和平的斗争日益高涨，同时也因为資本主义各国的进步文学近来不断地出現优秀的作品。

“共产党人”不但是一部巨型小說，也是新型小說；不但作为資本主义国家进步文学中的一部巨著而引起大家普遍注意，也应当認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之一。在这点上，法国的进步批評家和苏联的法国文学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弗萊維爾主要根据下列理由，說明“共产党人”是一部卓越的小說：作者写这部小說的計劃宏大，而实际上他确乎完成了这样大的計劃；其次是法国小說艺术上有悠久傳統的内心分析等重要手法，在这小說中有新的发展。因此，这位法国当代很有修养的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家認為“共产党人”标志着二十世紀法国小說的一个轉捩点。弗萊維爾也提到在这部小說中始終貫徹的生动活泼的气氛和异常熟練的語言，甚至指出“說和想”同时表現的这种新风格；这一切形成阿拉貢作品中特有的澎湃的气势^①，强有力地吸引着讀者，使讀者閣上

書本以后，繼續被这种滔滔滾滾的旋律所牽引。

“共产党人”这部五卷六分册^①的巨型小說，是一九四四年开始写的。一九四九年开始出版，到一九五一年便已全部問世。囿于政治偏見，资产階級文学界对于这部小說一直是表示冷淡的。进步的文学界对它表示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欢迎。法国工人喜欢在文娛時間听人朗讀“共产党人”。进步报刊曾經专为这部小說組織过多次座談会和討論会。在有一次討論会上，小說家安德烈·斯梯作了重要的发言^②。斯梯認為“共产党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作者通过推陈出新的艺术創造，使法国共产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領導思想和原則性的指示貫徹在具体的作品中。阿拉貢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作家所应当完成而不是常常能够很圓滿地完成的文学任务。因此，作家兼“人道报”主編的安德烈·斯梯認為“共产党人”的发表是法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重大而有持久性的事实，同时也是“我們党的一个重要举动”。

法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們对阿拉貢这部小說估价很高。多列士指出阿拉貢的功劳在于坚决站在党的立場写了一部斗争性很强的作品。加香認為这部小說的問世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法国开辟了道路。革命領導人对于“共产党人”估价的着重点是它的政治影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象这样一部作品，它在政治影响上的重大意义和它在文学成就上的重大意义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即使在这篇評論中我們企图比較地側重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問題，也不能不同时了解权威人士对这作品的政治评价。

① “气势”，法語verve（或fougue），是阿拉貢風格中鮮明的特色之一。

② 第五卷原文分上下册。

③ 見“共产主义手册”一九五一年第八期，后来收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斯梯的文艺論文集“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苏联的法国文学专家阿尼西莫夫在“共产党人”的俄文译本序言中肯定了法国的进步思想界对这部小说的极高评价，并且强调这部史诗式^①的巨著证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在象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繁荣滋长，因为法国工人阶级是有组织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党——法国共产党在捍卫和平民主和法国民族的独立自由的斗争中，获得法国人民日益广泛和一致的拥护；同时，这一政党和它所领导的法国工人阶级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热诚、坚决和久经考验的忠实友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在某些条件适合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这一种理论，恰好就是小说“共产党人”的作者阿拉贡从一九三五年^②以来一贯倡导的。

2

如果说“共产党人”这部小说一出现之后，只是引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和掌声，那也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为了很好地了解这部作品，我们确有必要考察问题的各方面。阿拉贡去年发表他的最近的重要著作——小说“受难周”引起无论在进步文学界或资产阶级报刊上众口一词的热烈赞扬。大家认为“受难周”的轰动一时的成就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文学界最突出的事件。可是这情况迫使阿拉贡发表了一种感想：为什么“共产党人”出版时的情况比较起来反而显得冷落一些？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批评家突然在小说家阿拉贡身上发现这许多当今法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才能和优点？阿拉贡自己认为这些才能和优点在

① 阿尼西莫夫称“共产党人”为“法兰西的史诗”。

② 一九三五年阿拉贡发表他的演说集“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共产党人”这部小说中早就达到成熟的程度了，因而使他感到不公平。这主要因为“共产党人”不但是—部政治倾向鲜明，战斗性强的作品，而且是用时事为题材，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者在小说中处于被告的地位，他们是以革命斗争的直接对象的面目出现的。怎么能希望他们来鼓掌欢迎这样的作品呢？他们以冷淡甚至蔑视的面孔对待这部小说，说“这不是文学，是政治宣传”，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至于“受难周”，写的是一八一五年的事。尽管这部小说的倾向性也很明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毕竟不会感觉自己是这部小说中的反动人物，因此可以放心地鼓掌叫好，说这是一部杰作。可是阿拉貢不能这样一針見血地和法国文坛上的资产阶级敌人去爭辯。他必須說服对他的作品怀有阶级成见的人：“共产党人”和“受难周”是用同样严肃的“艺术良心”（既然资产阶级文人和艺术家喜欢这个名词，在和他們打交道时，我們也不妨姑且借用一下），同样純熟的文学技巧写成的。

“共产党人”是一部巨型的小說，已經发表的六册只是第一集，还有二、三两集沒有产生。全部“共产党人”包括的历史时期是“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而已經出版的第一集包括的时期仅仅是“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按照这样的規模，第二、三集至少每集六册是很可能的事。全書出齐估計当在十八册左右。按照預告，第二集（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本应从一九五二年起陸續出版，可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尙未与讀者見面；而历史小說^①“受难周”却赶先在去年冬天出版了。当然，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現象。鉴于“共产党人”第一集問世后所引起的頗不一致的反响，阿拉貢感到有必要搁下写作这部史詩式的巨型

① 尽管阿拉貢自己一再声明“受难周”不是历史小說，我們为了方便起見，仍然称它为历史小說。事实上，这是和传统的历史小說有所不同的新型的历史小說。

小說之筆，另外寫了一部六百餘頁的歷史小說“受難周”。這未始不是一種含有深意的辦法，其用意可能在於看那些給“受難周”熱烈鼓掌的資產階級讀者和批評家，對早晚會出世的“共產黨人”第二集和第三集又將採取什麼態度。繼續鼓掌呢？還是突然又沉下臉來呢？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並不是簡單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這是一種新生的事物，它具有一切新生事物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它的前途是光明廣闊的，這一切都是無可懷疑的。可是在目前，它還是一種比較年輕的文學，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成長，它本身還有些不可避免的缺點。同時，作為一種新事物，群眾對它一時之間還不很習慣，不可能一致表示歡迎，而沒有絲毫疑問或顧慮。權威的評論家一致認為“共產黨人”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法國勝利的第一座里程碑，我們不妨補充說，這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一個資產階級還居統治地位的国家中的非常勇敢，同時也是極有意義的嘗試。

我們知道，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產生和成長也並不是從來沒有遭受到一些阻力的。不過那種阻力主要是善意的疑慮，人民內部的是非爭辯，即使有敵意的阻撓也是極個別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必然遭受到更大更尖銳的阻力，而且這種阻力主要是敵我鬥爭，縱使有一部分阻力出於進步讀者和評論家的善意的疑慮，也是占少數的。由此可以想見“共產黨人”出版以後在法國文學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值得探討的問題，並且由於這部進步文學作品產生於階級關係比較錯綜複雜，矛盾比較尖銳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里，它所引起的問題也必然是比較複雜的。這些問題往往不僅關涉到這一部小說本身，同時也關涉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法國的發展道路。

斯梯在他的发言中，向“共产党人”討論会提供了八个討論的題目：“小說与历史”，“作家与党的活动家”，“乐观主义的文学”，“反对公式化”，“所謂‘共产党人’难讀”的問題，等等。正如斯梯自己声明，他提出这些問題并不足以概括“共产党人”所引起的全部問題；而且斯梯从討論会主持人的地位只是把問題提出来，供討論时参考，他自己并没有多加发挥，作出結論。虽然我們找不到那一次討論会的記錄，但这些問題的提法在我們探索“共产党人”这部小說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时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关于“小說与历史”，“反对公式化”以及所謂“难讀”等問題。因此，下文将要不断地提到它們。

事情是这样的，不但通过譯本接触“共产党人”的外国讀者觉得这部小說“难讀”，即使法国讀者也有些人認為这書“难讀”；不但别有居心的資產階級讀者和評論家在嚷“难讀”，甚至因此而“怀疑”这部小說的文学价值，即使在态度友好的讀者之間也有人感觉这部書“难讀”。对于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來說，这样一个問題不可能不認為是重要問題。不管作品的思想内容多么正确，多么重要，如果它的表現方法，它的艺术形式真的是令人难以接近的話，就有必要首先正視这个問題，分析这个問題。究竟怎样“难讀”，“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难讀”？并且，也有可能这部書并不是象人們所想象那么“难讀”。但是为什么它給人以难讀的印象呢？

外国讀者認為“难讀”，可能問題在譯本上。“共产党人”确乎是一部很不容易翻譯的書。首先是語言的关系：全書几乎通体用非常熟練、流暢、生龙活虎般的口語化的文笔；譯者如果碰到困难，往往不是乞灵于任何詞典所能解决。这是一种直接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語言，必須熟悉有关的生活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并且賞

鉴这种語言的妙处，否則不免格格不入。

原文是不是“难讀”呢？应当說也“难讀”，也不“难讀”。总的說来，“共产党人”决不是一部难讀的小說。除开別有居心的讀者的叫嚷之外，一般接触原文的讀者之所以說“难讀”，一半是因为他們缺乏耐心，另一半是出于誤会，随声附和。至于对于法国語言的掌握程度尙待提高的外国讀者，接触了原文以后也跟着嚷“难讀”，自然又当別論。对于一般的讀者来說，“共产党人”一起头会給他們生疏的感觉。但是讀者如果耐心一点，坚持下去，讀完一定的頁数（各人的情况不同，需要突破的頁数也不同），就会渐渐习惯，渐渐地听懂對話，弄清情节，同时，开始为这技巧与众不同的小說所吸引，渐渐感觉它有一种你从未經受过的艺术魅惑力，使你不忍释卷，恨不得一口气讀完六册^①。

使人起头感到生疏，逐渐习惯，最后发生很大的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应当說明的是作者所用的語言和他的新风格。与其說“共产党人”这部小說是写成的，不如說它是口述的。問題不仅是用口語体代替文章，或者把口語和文章的距离尽量縮短，而是用說書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同时逼真地摹拟故事中各个人物的語調和口吻^②。“共产党人”这部篇幅庞大的小說有十分丰富而且

① 中譯本三册，共計一百四十三万余字。

② 不仅小說中人物按照各人身份設話，換言之，各人用适合自己身份的語言；而是更进一步，小說的叙述也用人物的口吻，而不用作者的“局外人”的口吻。这一手法也不是阿拉貢首創的。左拉在他的某些小說，尤其是“小酒店”中，已經試用这种口述体。巴比塞的“左拉”評传中指出，如果作者不置身于人物之中，使自己成为人物之一，用人物的思考方式来思考，用人物的說話方式來說話，用人物的語言来写小說，那么人物就会不象真实的人物。这种口述体使作者和人物結合为一体。（見巴比塞：“左拉”，原文本，130頁。）在這兒，又一次証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貢努力繼承优良传统并且加以发展。

复杂的内容，它的表现方式随着内容不同而变化多端，可是上边所说的口述体却占主要部分。在一般情况之下，这种口述体和第三人称的间接叙述法夹杂使用，交错展开。这种口述体的另一特点是人物的思考、梦幻、独白、对白和行动都连缀一片，对话往往来不及用引号^①。因而从第三人称转到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要不然就是相反的方向转换，都异常迅速。这类例子多不胜数，随手翻开书来都可找到：

真的，就在附近。再说出马约门到那儿去很方便。何况玛丽·亚岱尔童年时期曾经在纳依住过。我从来不愿意离开那儿太远。她坐在弗莱特身旁，他开车灵妙如神。^②

这并不是什么精采的片断，无非是随手找到的人称转换的例子。文中忽用第一人称，忽用第三人称，其实都是指玛丽·亚岱尔。这一段文字虽然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事实上是玛丽·亚岱尔内心独白——她的沉思。如果朗读这一段应当和这段紧接的上文玛丽·亚岱尔的谈话用同样的声调，不过要抑低一些。这一段相隔不远的地方，还有类似的例子：

特·布勒亚太太从来没有到过土耳其。不过她有一些在卢弗西安置有房地产的美国朋友……我疯了，不在卢弗西安，在马里·勒·洛亚！弗莱特，你到安卡拉去是有任务的吗？……自然啦。我们答应土耳其人一大堆东西，结果什么也不送去。所以必须去叫他们耐心等待着。玛丽·亚岱尔咬着嘴唇，朗多尔小姐是不是很好地完成叫土耳其

① 这种连缀式的写法，如果单纯从形式上看，不免令人联想起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 Marcel Proust 和英国小说家 James Joyce 的风格。必须指出，这仅仅是形式上的近似（仔细一看，即使是外表，也还相去很远的），至于在精神和本质上，阿拉贡的风格和上述两小说家毫无相同之处。

② 见原文本第四卷 72 页，中译本第四卷 463 页。

人耐心的任务了呢？①

在一段里，开头那一句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接着是特·布勒亚太太（就是瑪丽·亚岱尔）和弗萊特的对话，最后是特·布勒亚太太的沉思。在“共产党人”中，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不加引号，不分行，只是在情节迅速展开时这样。到一定的场合，对话成了主要动作，成了重点，也就用分行的形式。因此，这种说的和想的联在一起、你说的和我说的接成一片的写法，并没有使文章显得单调，反而变化多端，增加行文的生气。至于朗读起来，这样写法效果比一般的对话前后边加上“某某人说道”，“某某人回答”之类的累赘说明要好得多。可是这种文体对于不习惯的读者会成为一种障碍，但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障碍。

弗萊維尔说“共产党人”是小说家和诗人结合起来的艺术作品，的确是有道理的。也许阿拉貢毕竟是诗人底子，所以他写的小说有某种普遍存在的抒情气氛。可以把“共产党人”的作者设想为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故事，并不是简单地交代事件怎样发生，怎样收场，也不是象会议记录似地告诉你某人说什么，而是围绕某一主要事实，或依据某一个突出的思想或情感，让语言的洪流泛滥成壮阔的波涛。不习惯的读者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件事情上有这么多的话可说。然而这些话都不是浪费的，它们在奔放的过程中不但展现了无数有声有色的细节，增加故事的真实感，并且造成一种拥抱一切的旋律，使这内容复杂的小说，凝结成一个整体，好比一支宏阔的交响曲。这种魄力，这种抒情诗式的铺张，和十九世纪上半期那些浪漫派诗人的长篇巨著，似乎也多少有相似之处。假如可以说一部作品从它的思想和情感的实

① 見原文本第四卷 73 頁，中譯本第四卷 464 頁。

質，以及从立場和观点来看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在表现方法上不妨带有一定程度的浪漫主义的成分，那么阿拉貢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共产党人”，应当考虑为这种作品的具体例证之一。可是已经习惯于二十世纪多半个世纪以来的干巴巴的散文的法国读者，不免感到“共产党人”不合常轨，甚至“难读”，却也是不难理解的现象。

这种在现实主义基础上采用部分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上边提到的口述体的叙事方式，都不是在“共产党人”中第一次出现的。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同一作者的短篇小说集“法国人的伟大和屈辱”，尤其是其中最长的一篇“罗马法已不存在”^①，已经是这种新的艺术途径的探索。可是好象没有听人说过短篇小说集“法国人的伟大和屈辱”“难读”。也许由于这一短篇集远不如“共产党人”重要，人们不大注意它是否好读或难读。同时也因为造成“共产党人”“难读”的原因不止短篇小说中已经开始出现的口述法和抒情气氛，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至少应当再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那就是这部巨型小说的结构问题。简单地讲，“共产党人”包括的主要故事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主要的情节不是只有一条线索而是有若干个头绪，甚至简直可以说“共产党人”不是单纯一部小说而是好几部小说的综合体。这已经大大增加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习惯的感觉和难读的印象，何况事情还不止是这样。作者并不满足于将若干故事纠缠在一起，他并不是将这故事象珍珠一样用一条丝绳一颗接一颗地贯串起来，串成一条项链。他把每一个故事都分成若干段落，然后把它们错综交織，綴成一幅极长的“花毯”。举例来说，“共产党人”第二卷一厚册共分二十章，从每章

① 見“阿拉貢詩文鈔”，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的內容看，錯綜和交織的安排方式是很明顯的：

第一章：資產階級社交生活，巴黎一家大咖啡店的露天座上，有幾個思想反動的軍官和一個所謂“貴夫人”在閑談時事。

第二章：共產黨員阿芒·巴邦達尼应征入伍，坐火車到集合地點去的情況。

第三章：資產階級政治舞台的側寫，社會黨眾議員多米尼克·馬洛熱中於做部長，到處鑽營的丑態。

第四章：应征入伍的共產黨員巴邦達尼在軍營中的生活，猜疑和迫害的空氣包圍着他。

第五章：巴黎的一個黨小組的地下活動，黨員瑪格麗特·高微薩和洛貝克等的初步介紹。

第六章：反動政客馬洛，韋思貢第等人的活動。

第七章：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初的總動員令頒布後，应征入伍的共產黨員在部隊里的生活，他們之中有工人黨員瓦里耶，種葡萄的農民黨員伯茲和知識分子黨員塞布龍等。

第八章：接受黨的任務，準備轉入地下的知識分子黨員費爾澤和他妻子兒女不得不暫時分散的情況。

第九章：在部隊里的黨員的地下活動。

第十章：巴黎資產階級的所謂“高級社會”的社交生活，沙龍中的名媛淑女和紳士們的清談和調笑。

.....

不需要把二十章全部列舉，上面介紹的十章已經充分說明小說的布局：資產階級社會和共產黨員活動的場面的錯綜和交替，前綫（部隊）和後方（巴黎）生活場景的並比和對照，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不習慣的讀者會感覺到仿佛小說中有無數個故事在萬馬奔騰，并駕齊驅。實際上，作者確乎把一個故事分成無數片段，斷斷

續續地分布在全書各處。賽西爾和讓·德·蒙塞的戀愛故事貫串全書，若即若離，若隱若現，和其他的無數故事掩映交錯，增加了情節的委婉曲折^①。如果把这个戀愛故事集中起來寫，干脆開門見山，痛痛快快地下子交代清楚，恐怕反而索然無味了。連戰爭中身受重傷，双目失明，兩條手臂全被鋸去的共產黨員吉戈瓦在醫院中療養時，念念不忘黨的鬥爭和工人弟兄們的命運的這樣深刻動人但是情節比較簡單的故事，也分成幾段，散見於第二卷第二十章，第四卷第六章和第十章等處。把題材這樣組織起來無疑是有它的特殊的藝術效果，但同時却增加讀者對於這部小說的“難讀”之感。

關於“難讀”問題，安德烈·斯梯有他的看法。他的意見可能和我們的意見不完全一致，却也是有用的參考。他認為“象‘共產黨人’這樣一部書，尤其是第五卷，無疑地不是供讀者消遣的。應當迴避的暗礁，恰好是想使我們的文學成為單純消遣品的這種要求”。斯梯的意見很明白：一部文學作品即使真的難讀，不一定就要不得；反之，如果輕鬆易讀，也不一定就高明。他還引用日丹諾夫的話，說明文學固然必須為人民大眾服務，使人民大眾能夠了解，幫助他們進行鬥爭，卻不等於說文學就應當永遠跟隨在人民大眾的水平和需要後面。文學應當進一步提高人民大眾的要求，發展他們的愛好的範圍。從這原則性的看法中，斯梯引申出這樣的結論：“那些僅僅站在人民的目前愛好的水平，或者低於這樣的水平的作家，大有迅速地被人所瞧不起的危險，這人民將要完全有理由地責備這些作家不幫助他們進步。”^②

至於“共產黨人”這部小說究竟是否“難讀”或“難懂”，斯梯不

① 這種寫法令人聯想起克利斯朵夫和安多納德的戀愛故事在全部小說中的穿插。

② “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文本，77頁。

作結論。他希望大家先耐心地把小說从头至尾細讀一遍，然后发表意見，自由討論。不过，他說：“不要从对于作家这称号的一种貧乏而貶值的概念出发，这种看法和我們对作家的概念毫无相同之处。”斯梯在这兒所說的“我們”，当然是指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次討論会的参加者主要是法国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3

一般地說，“共产党人”的讀者遇到的“困难”都屬於表現方式上的問題，也就是說有关小說的艺术面貌的問題。我們在上面作了一些肤浅的探索，都不出所謂表現方式这一范畴。但是，如果認為“共产党人”的作者在写小說的艺术上所下的功夫，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新嘗試，都无非在小說的形式上要耍花枪，其目的不外使讀者眼花缭乱，贊为新奇，那就完全錯了。不管它究竟是“难讀”还是易讀，反正“共产党人”給法国的小說艺术开辟了若干新的方面，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然而更其可以而且应当肯定的是，这种艺术上的新嘗試完全是由小說的主題思想，小說的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作者处理事物的立場和态度以及作者在創作这部巨著时对自己提出的重大任务和严格要求所規定的。

阿拉貢給他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一种新的任务。在法国文学史上，在他以前沒一个小說家企图写作这样的一部小說，并且根本不可能設想，因为無論在巴尔扎克写“人間喜剧”的时代，左拉写“卢貢一馬加尔家族”的时代，罗曼·罗兰写“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欣悅的灵魂”的时代，或者罗杰·瑪丁·杜·加尔写“底波一家人”的时代，都還沒出現象今天这样政治上成熟的法国工人階級和他的先鋒队和領導者，法国共产党，当然也沒有在爭取持久和平与人民

民主的斗争中觉悟普遍提高的法国人民大众。上述“人间喜剧”等长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总集的作者，都企图在小说中表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法国社会，企图通过浩繁的篇幅或一系列的长篇小说来直接描绘和间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面貌。在这点上，他们和“共产党人”作者的企图相同。但是他们的创作方法都是通过个别的人，或一个家庭、一大家族的遭遇，来反映时代的面貌；而“共产党人”却与此不同，在这部新型小说中固然也写个人的或家庭的遭遇，但同时也直接写重大的时事，写千军万马的战场、政府首脑的活动和议会舌战的场面，而且用真人真事，真姓实名的方式写的。固然司汤达在“巴尔玛修道院”中也写过滑铁卢鏖战的场面，左拉在“崩溃”中也写了普法战争，至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更是把历史搬进小说，但是他们和“共产党人”作者的创作方法有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小说，不论是巴尔扎克或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写的不外乎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的冒险，个人的奋斗和成败。换言之，从个人角度来看历史，反映或描写历史事件。而“共产党人”这部描写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大事的巨型小说，却是第一次以这样重大的份量，这样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艺术手法，从一个阶级——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历史，写历史。具体地说，阿拉贡是从法国共产党的角度，站在法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法国近代史上这一个极端动乱、复杂和重要的时期的。“共产党人”是作者有意识有计划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小说，因此它和过去一切描写社会生活的巨型小说有深刻的、本质的区别。“共产党人”作者给自己的提出的是一种要求用新的表现方法来表现新的思想内容的任务。

“共产党人”包括的历史时期是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年月，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法国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向德国宣战的，小說的情节开始在那一年三月，也就是大战爆发的前夕。一九四五年八月，巴黎从納粹占領者鉄蹄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說小說将要結束于法国解放的前夕。已經发表的五卷六分册結束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初，那时法国军队已經土崩瓦解，希特勒的侵略軍迫近巴黎，巴黎的陷落成为不可挽救的定局^①。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〇年六月这十五、六个月期間，法国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小說主要情节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三九年三月至九月初是第一阶段，那是战争爆发的前夕；三九年九月至四〇年五月十日是第二阶段，那时德法双方按兵不动，宣而不战，形成所謂“莫名其妙的战争”；四〇年五月十日希特勒军队侵入比利时，法軍北上迎战，到六月四日，法国北部和比国南部的所謂佛兰特地区的战役已經以法国军队的崩潰，英国军队的逃跑而告結束，德国侵略軍冲向大門敞开的巴黎。貫串在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法国社会的特殊情况是資產阶级反动統治集团的法西斯化一天比一天猖獗，法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向这种危害人民的恶势力作无情的反击，双方矛盾日益尖銳，斗争日益剧烈。尽管納粹德国的侵略势力在那时已經剑拔弩张，而且法国是直接受威胁的，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却比国际間的民族矛盾尖銳得多。在法国大資產阶级所謂“二百家”富豪以及他們的走狗——那些反动政客的心目中，他們的真正敌人不是納粹德国，而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他們惧怕和提防国内的工人阶级，甚于門外的强敌。

小說一开始就描写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在意德两国的法西斯政府直接支援和英法两国反动政府間接帮忙之下终于得逞；战敗的西班牙人民军队与民主分子狼狽不堪地越过边界到法国来避难，

① 六月十四日，法国反动統治集团将首都拱手讓給敌人。

他們受了同情法朗哥的法國官方的粗暴待遇。這個“序幕”是意味深長的。首先，這是法國統治集團進一步壓迫國內的民主勢力，進一步趨向法西斯化的一個信號。這一場面，和小說第一集第五卷結束時所描寫的法國人民在納粹侵略者的炮火下倉皇奔命的場面是遙遙呼应的。總而言之，整部小說敘述的是法國人民在這苦難的年月里遭受國內外法西斯勢力殘酷折磨，以及法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向國內外的敵人展開頑強的鬥爭的經過。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日，以达拉第為首的法國反動政府頒布了解散共產黨以及其他工人組織的法令，不久就大舉逮捕黨員和同情分子，同時密切監視应征入伍的黨員，尤其是中下級軍官^①，以便隨時逮捕他們。至於共產黨議員，則因碍於憲法，不能隨便拘捕，於是捏造了一件挑釁性的審判案，加以莫須有的叛國罪，以便實現拘捕的陰謀。這時，多列士，杜克洛等法共領導同志，由於群眾的支援，隱蔽得很好，反動派費盡力氣也找不到他們的影子。轉入地下的黨組織活動得很積極，不斷發行油印的“人道報”和其他宣傳品。這些都使反動派又急又恨，於是頒布了抓住身藏共產黨宣傳品的人一概處死的法西斯法令，同時也說明反動派是多麼害怕工人階級。一九四〇年六月初，法國軍隊崩潰後，反動政府採取了更毒辣的對策，一面撤回殘兵敗將，以便保全一部分實力來鎮壓可能趁着統治者吃敗仗而起義的勞動人民^②，一面散布流氓式的無恥謠言，說什麼法國的戰敗應當由共產黨和猶太人來負責，他們早就隱伏在軍隊中到處進行挖牆腳的工作。事實上，出賣祖國，出賣人民的恰好是法國大資產者及其走狗們，那些反動政客

① 高級軍官中沒有黨員。

② 當時法國反動派十分害怕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重演。見第五卷第二十六章。